

●文学

顺时求变却抱残守缺

——试论圣经中先知形象的嬗变

侯灵战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系, 广东 广州 511450)

摘要:圣经中的先知起源于中东特有的巫术背景,其特点是神秘性和预言性。摩西宗教只有祭司才有与上帝对话的特权,然在犹太王国后期及亡国时期,正典先知举起了社会正义、民族复兴大旗,获得与上帝对话的权力,同时也赢得了先知的美誉。先知运动后,先知没有改变其本质上的神秘性和预言性,往往成为犹太教、基督教的异端。

关键词:先知; 预言性; 上帝

中图分类号:I299; B9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322(2008)02-0037-05

圣经中记载摩西领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耶和华在西奈山与希伯来人订了后来被称为“摩西十诫”的契约,宣布自己为希伯来人的唯一信仰神,并且规定亚伦家族为其世袭的祭司(见《圣经·出埃及记》第28章1:“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本文引用圣经文句较多,为精简篇幅,圣经引文用括号注记圣经的书卷时,采用《国语和合译本》的简称,如“申命记”简称“申”,“撒母耳记下”简称“撒下”等)。从这个规定看,以后希伯来的宗教生活中,只有作为祭司的利未人亚伦家族才有资格与上帝耶和华建立一种直接对话关系,普通希伯来人须借助祭司这个中介才能与上帝进行人神交流。可实际情况如何呢?在希伯来历史中,除利未祭司外,拥有与神对话权利的人姑且不说此前的亚伯拉罕、雅各、约瑟等,还出现先知一类宗教人物也能与上帝直接对话。这样看来,尽管希伯来先知群体并没有纳入其民族创始人摩西所设计的宗教政治结构之中,但由于古代近东地区巫风浓厚,先知这一宗教群体还是活跃在希伯来的民间社会,拥有事实上与神对话的权力,并构成了对祭司宗

教话语权力的强有力挑战。王朝期间,希伯来先知群体的社会力量强大,曾一度被纳入希伯来宗教主流之中,有时对王权可施加重要影响(王上22:6)。犹太大流散后,古典先知倡导的宗教观念、道德价值和民族意识虽被犹太社会所接受,《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及十二先知书也成为犹太文化经典,但由于先知的神秘倾向和预言性质,先知这一宗教群体遭到渐已成型的犹太教抵制,后终被析离出犹太宗教结构。

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有几种人物都可称为先知:rōeh(观看者、预言者、卜者)、hāzeh(幻想者)、nābhi(先知)、is-elohim(神人)(本段对先知不同称谓的辨析,参考了中国韩彼得牧师的文章《论先知》)。rōeh和hāzeh本义中有“看见”之义,故在中文圣经中译为“先见”;nābhi本义有“冒出”、“流出”、“发出”的意思,中文译为“先知”。nābhi应该说是希伯来早期比较正规的先知,由rōeh转变而来。《撒母耳记上》记载:“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罢!现在称为先知(nābhi)的,从前称为先见(rōeh)。”可见先见是

收稿日期:2007-03-15 修回日期:2007-06-25

作者简介:侯灵战(1971—),男,江西上饶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犹太文学、文化的研究。

先知较早的一种称呼。is-elohim 称呼先知,有时也称“神人”,如摩西被称为以色列最大的先知(申34:10),人们也称其为神人,其他被称作神人的先知有以利亚、以利沙(王上17:24;王下1:13,4:9)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先知等(王上13:1)。

尽管早期先知有着种种不同称谓,这些不同称呼也表明它们有着细微区别,如 rōeh 着重在“见”(异象、异梦),而 nābhí 则着重在“说”(预言),然作为人与上帝的中介,其功用还是大致相似的。从犹太教发展进程看,犹太教的前身——注重祭祀的摩西宗教似乎并没有赋予先知上述这个角色和功用,尽管摩西本人被后人称为最大的先知(摩西为先知 is-elohim,可能更在于其超乎常人的神性,故“神人”,当然摩西本人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但摩西宗教中,只有祭司(摩西本人除外)才拥有与上帝对话的权力。此中缘由,或许是早期人类历史,宗教即是政治,拥有宗教话语权为极大政治权力。作为以色列民族的创始人摩西并不想把这种权力拱手让给他无法控制的先知人群,而把它交付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兄长亚伦。当然,此举也可说明在出埃及的征途中先知势力的羸弱,羸弱到让摩西可以忽视的地步。然而,希伯来人在迦南定居后,摩西宗教并没有获得神圣契约中应有的效力和影响,《利未记》对祭祀的程式写得极其铺张和繁琐,但与此相应的祭司与上帝对话的角色并没有得到在迦南定居的希伯来人的广泛认可;《约书亚记》中把利未人穿插在犹大、以色列的十二部落中,试图以信仰控制希伯来社会和维系希伯来人的向心力,然此番并未如愿地实现摩西宗教原初所设计的企图。士师、王国时期,利未祭司确实能够如期地收取人们的什一奉献,也行使着对希伯来世俗王的受膏职权,可谓是希伯来政权中重要一极,然本属祭司与上帝对话的垄断权力还是被边缘群体的先知所打破,这些活跃在古代近东地区的巫师、法师和占卜者,占据着巨大的宗教活动空间。士师期间,撒母耳亲自创办了先知学校;王国时期,已出现为统治者决策咨询的“宫廷先知”,如大卫王的先知拿单和迦得。可见,先知的角色和能量也曾有一时的辉煌,一度被主流社会所认同。

先知虽然王朝时期前后地位有所改变,但神秘性和预言性还是伴随着其发展的始终,特别在

早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神秘性表现在:先知在与神对话时一般都须成群地奏乐、唱歌、跳舞等,直至达到一种近乎疯狂的欣快状态,然后在这种精神恍惚的幻觉中与上帝对话和沟通。当然,先知有时也不必凭借音乐、舞蹈等,“神的手”会突然强烈地“抓”住他,其“抓”的过程极其诡异,有时伴随着神迹出现。先知的神秘性还表现在先知特殊的蒙召经历。nābhí 这个词在闪族语中就有“呼召”、“宣告”之意,它的被动语态可作为“被召唤”。先知是“被神抓住的人”,他本人在此状态下是被上帝宣召身负上帝托付使命的使者,如摩西、撒母耳、以利亚、以利沙、耶利米、以西结等先知都有特殊的蒙召经历。先知的神秘性还表现在他们能行神迹奇事,比较突出的有摩西、以利亚和以利沙,因此他们也被称为神人。像以一个饼给多人吃饱为原型的神迹故事不仅在摩西和以利亚身上发生过,在新约中的耶稣身上也有重演(出16:12—36;王上17:10—16;马14:15—21)。

先知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预言性。先知可预言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预言自己没有耳闻目睹的事情(过去时的或现在进行时的)。如扫罗在登基为王前,曾为他家丢失的三头驴而问撒母耳,结果撒母耳告诉他驴已经找到,不必为此担心(撒上9:6,10:2)。二是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利亚、以利沙以及后来的经典先知都针对以色列和犹大当时的政治、社会、宗教发出了许多预言,他们借此希望君王、祭司、百姓都能按照真理而行,不行邪道。三是能够释梦和解读异象等,此为其一种重要的预言本领。很多先知能从梦和异象中得到有关个人蒙召和有关国家民族的预言。先知的预言方式通过口述和书写,有时也通过形象化的表达方式,如先知何西阿以娶淫妇为妻隐喻地表达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叛。

二

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一场旨在教诲民众、革新宗教、改良社会的先知运动先后在以色列和犹大国兴起。先知运动形成的契机和发展的动力是以色列人相继遭遇亚述时期和巴比伦时期的民族危机。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至前7世纪初,异军突起的亚述帝国打破了近东地区此前的政治均衡和胶着状态,曾经在迦南夹缝中繁荣了

百年的犹太王国(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面临着生死抉择。在此危机中,大部分祭司阶层碌碌无为,而一大批先知精英,开始关注国计民生。这些先知对祭司、国王、富人、普通民众、甚至先知队伍本身的腐败与堕落现象进行激烈的抨击,宛然成为神的代言人。第一批古典先知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弥迦等力挽狂澜,谴责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混乱、伦理道德的堕落,呼吁他们归向上帝,并警告以色列人若继续为非作歹,国破家亡的惩罚就在眼前。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至前6世纪,加勒底人在亚述帝国衰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巴比伦王国,成为近东地区的新霸主。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焚烧,犹大人被虏,犹太民族国破家亡。当时的先知西番雅怒斥犹大人道德败坏,信仰堕落,预言“耶和华的日子”不日即临;那鸿宣布尼尼微的倾覆,亚述行恶自招毁灭;哈巴谷因加勒底人的崛起而忧心如焚;耶利米于犹太亡国期间以泪洗面,终日为民族命运而奔波呐喊;以西结作为“被虏的先知”历数拜偶像的罪孽,提出民族复兴的个人责任,并满怀激情地重绘出新圣殿和新圣城的宏伟蓝图。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前4世纪初,犹太人在波斯统治下陆续回归耶路撒冷,实现了重建圣殿,复兴故国的梦想。这时候的先知第二以赛亚为重归故国而欢唱,哈该、撒迦利亚为修复圣殿而疾呼,俄巴底诅咒对敌族以东人,玛拉基、约珥劝告民众弃恶向善,宣告了末日审判。

古典先知是先知运动的直接产物。古典先知也叫经典先知、正典先知、后先知、写作先知等,一般指圣经旧约中《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先知书中的作者。可以肯定地说,古典先知不止先知书中的十几人,其背后必定团结着一批有着共同信念的先知群体,只是因为某种原因如没有留下书面文字、或被圣经编撰者删除等,只留下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人成为他们的代表^[1]。从表象看,古典先知似乎与之前先知并无两样,神秘性与预言性在古典先知都有所继承和体现。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阿摩斯等先知都有特殊的、神秘的蒙召经历。他们的装束也和以往先知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以利亚开创的先知装束,如“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下1:8),古典先知也照旧着扮。以赛亚和弥迦不仅身穿麻

衣,有时甚至露身赤脚而行(赛20:2,弥1:8);古典先知行为怪诞,人称其为“穿毛衣哄骗人”(亚13:4),以此看似乎他们的社会境遇和地位并没有改善多少。古典先知也释梦和解读异象(赛8:1-4,但7:1,耶18:1-12),走向极端形成了启示主义风气;也大肆进行预言活动,形成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末世论和弥赛亚学说。

然而,从本质上看,古典先知已从nābhī中洗身出来发生了骤变,使用nābhī这个词已经很难概括古典先知的特色。首先,如果说nābhī从古代近东民间巫风演化而来带点异教的性质^[2],如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撒28:3-25),此时的先知自觉向耶和华一神教靠拢,坚决捍卫耶和华信仰。古典先知反对偶像崇拜,抵制异族的巴力崇拜(何2:8、12、16,耶11:13)、亚舍拉崇拜(何4:12)、亚斯他录崇拜(何4:11-14,耶2:20,3:6-10)、米勒公宗教(摩5:26,耶19:1-34),反对“交鬼的”、“行巫术的”(赛8:19、29:4)、“占卜的”(弥3:7)、“观天象的”(耶10:2),而后者原为nābhī或多或少染有的术数。古典先知对耶和华信仰的是虔诚的、严肃的。犹太人从波斯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时,可能迫于现实压力与异族联姻,这都受到玛拉基、撒迦利亚等先知的强烈谴责。其次,古典先知坚定耶和华唯一神信仰,与祭司为主的申命运动的想法不同,即使祭司出身的耶利米、以西结等古典先知,也不在意固定、繁琐的仪式,不在意祭品优劣,而更重于心灵的虔诚、道德的完善。阿摩斯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1-24)古典先知促使希伯来原始的祭祀性宗教向伦理型宗教转变。第三,古典先知从原来为普通人解释难明的事理、行施祛厄消灾的法术,或者为某统治者服务的宫廷先知,转向关注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古典先知批判统治者不体恤民众,崇拜异族神祇;批判富人为富不仁,普通民众对耶和华信仰心存二意;批判祭司“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何4:8);批判假先知杜撰言词,编造谎言,按宫廷和圣殿希望听到的进行预言,等等。古典先知几乎是社会正义的化身,他们自甘身处

社会边缘,承受社会重压,对社会的良知和公义进行呼唤。古典先知除继承原来口述传统外,也用文字把神的言语“刻在版上,写在书上,以便传留后世,直到永永远远”(赛30:8)。古典先知的这些特性,都是以往 nābhī 未曾广泛拥有的。

古典先知与 nābhī 并没有截然的时间分界线。先知运动期间,宫廷、民间同样存在 nābhī 在进行宗教活动。在当时,古典先知的形象与 nābhī 很难区别,遭遇也及其相似,以赛亚因斥责玛拉西王的罪恶,被玛拉西用锯锯死;耶利米被带到埃及后,被人用石头打死,这种乖舛的命运对古典先知和 nābhī 来说都是可能遇见的。然而,鉴于古典先知对 nābhī 的重大革新及其广泛、深刻影响,古典先知与 nābhī 已分属于不同性质的两个阶段了。

三

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起,先知运动渐趋衰弱。原因之一是俘囚期间及波斯时代前期,独尊唯一神耶和华的犹太教渐趋形成。犹太教的根本大法“摩西五经”失而复得,以及《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等由申命派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在巴比伦编撰成书,这些对希伯来民众来说比先知学说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政治上,亡国前的希伯来民族国家被依附于波斯帝国的犹太教社团所取代,祭司(以及文士)作为犹太官员最终取代原国王成为民众领袖,先知的地位也因此一落千丈。

先知运动衰弱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先知本身。古典先知虽然独尊耶和華唯一神信仰而舍己忘我,为国家民族命运而颠沛流离,为社会公义和人间正道而奔波呐喊,但是古典先知本身并没有彻底丢弃 nābhī 身上的神秘因素。nābhī 的释梦和解读异象发展为古典先知的启示主义;nābhī 的占卜预言发展为古典先知的末世论和弥赛亚学说,这些都为犹太人走向疯狂埋下了种子。希腊化时期的玛加比民族起义,曾在犹太人中散布着一种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说犹太人中将要出现一个像大卫王一样的救世主,救赎以色列国民,然玛加比的救世主身份并没有得到犹太人的广泛认可,犹太人也并没有因此救赎。在新旧约之间四百年的“沉默时代”,有关救赎的异象与先知的末

世预言被说得煞有其事,然末世的日子终被时间证明为谣言,弥赛亚的期望总被落空。因为有太多的被证伪经历,先知在大流散期间让大多数犹太人反感和拒绝。毕竟,神秘性和预言性是先知自诞生就存在的特性,先知只有摒弃神秘性和预言性,其社会作用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以赛亚、以西结等古典先知之所以能够得到后世以色列人的承认,主要是因其提倡的宗教观念、道德价值和民族意识,这才是其流传百世的根本。先知在大流散时期被抛弃在历史之外,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发扬古典先知的优良传统,没有彻底抛弃先知的神秘性与预言性,以至于先知角色在犹太教的结构中没有立身之地。

当然,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先知对犹太民族、犹太—基督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借助以先知身份进行传播而发展起来的,耶稣和穆罕默德都自称为先知,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穆罕默德甚至宣称自己是继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后的最后一位“封印”的先知(《古兰经》卷22.33:40)。耶稣、穆罕默德传道的成功固然说明近东地区根深蒂固的先知传统以及古典先知提倡的末世论和弥赛亚观的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实际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成功更在于其传道的内容,耶稣的普世的爱和穆罕默德的民族主义,远比先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更有诱惑。在犹太史以及欧洲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有关“耶和華的日子”降临的预言,这些末世论具体到某一时间,把弥赛亚落实到某一具体的人物,一般事后都定性为谣言或邪教。由此看来,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成功,本质上不是先知传统的复兴,而是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两个伟人借助了先知的旧瓶装进具有时代需求的新酒。有趣的是,耶稣和穆罕默德的传道伊始,都遭到犹太人的抵制,可见犹太人对先知的警觉性非常高的。对犹太人来说,对于末世的审判和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宁可把它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和宗教的企盼,而不会把它作为现实的追求。

四

在犹太教的发展进程中,先知打破了利未家族与上帝对话权力的垄断,瓦解了祭司的宗教特权,使犹太教摆脱了原始的祭祀本质,特别是处在

民族危机中的古典先知,顺势求变,抛弃原始宗教的祭祀形式,追求宗教的伦理性质,使摩西宗教转变为伦理型的先知宗教。然先知宗教抱残守缺,本质上也是一种神秘的、激情的宗教,只有先知宗教让位于由犹太文士所建构的哲学型的拉比犹太教,才使其成为阿诺德·汤因比所定义的高级哲学宗教^[3]。

由于先知本质上不可摆脱其神秘性的预言性,因此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受其影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本身也隐含着神秘主义的迷信。实际上,圣经正典先知书的传承,经由圣经编撰者的筛选和一定程度上的删改,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知实质上是后知。由于国内学者在研究圣经或犹太

先知时,关注正典先知的正面意义时,没有恰当正视先知本身的神秘性和预言性及其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以至于我们对正典先知的认识代替了对历史中先知群体的整体认知,这种以偏概全的倾向是应该注意的。古典先知对社会公义的追求以及自担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固然值得肯定,而后世把歌德、左拉、萨特等文人称为时代先知,正是对先知这一层意义的考虑;但先知的神秘性和预言性也使先知这一群体在社会史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一些社会重大灾难时候,如中世纪黑死病年代、二战期间,甚至在公元2000年世纪之交,社会底层弥漫着末日审判和基督降临的预言,这正是先知丑陋的尾巴。

参考文献:

- [1]塞西尔·罗斯. 简明犹太民族史[M]. 黄福武,等,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49—49.
 [2]梁工. 古犹太先知文学散论[J]. 南开学报,1996,(3):26—30.
 [3]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M]. 刘北成,郭小凌,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02—302.

Change According to Time, but Unchanged in Essence ——the change of prophet's image in *Bible*

HOU Ling-zhan

(Management Department, Guangdong Woman's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511450, China)

Abstract: Prophet in *Bible* coming from special witchcraft background in the Middle East had two characteristics, mystery and prophetic. Only shaman had the privilege to talk to God in Moses. Classic prophets earned their reputation for supporting social justice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late Jewish Kingdom. They remain mysterious and prophetic, after the Prophet Campaign, and the prophet came to be heresy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

Key words: prophet; prophetic; God